

海峡交通史论丛



海风出版社

海峡交通史论丛

海 风 出 版 社

二〇〇二年一月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海峡交通史论丛/编委会编辑. —福州: 海风出版社, 2002. 2

ISBN 7-80597-399-7

I. 海... II. 编... III. 海上交通—交通运输史—中国—文集 IV. F552.9—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05874 号

ISBN7-80597-399-7/G.66

海峡交通史论丛

海风出版社 出版

(福建·福州市鼓东路 187 号 邮编: 350001)

中共福建省委文印中心 印刷

开本: 889×1194 1/16 21.75 印张

2002 年 1 月 28 日第一版 2002 年 1 月 28 日第一次印刷

印数: 1—1500 册

ISBN7-80597-399-7/G.66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海峡交通史论丛

编辑委员会

主任委员：杨国桢 杨华基 陈 玲

委 员：邓孔昭 马继列 谢必震 王连茂 陈式海

编 辑：谢必震 陈式海 黄阳辉

责任编辑：梁希毅

封面设计：卢茂欣

序

台湾海峡两岸的海上交通，是中国乃至亚洲海洋交通的重要一环。从远古的原始漂流到东洋航路的开辟，先民们对海洋交通环境条件的改善，使台湾纳入中国人主导的东亚和东南亚的海洋贸易网络之中，促成了台湾的开发。两岸对渡的帆船，连接生产和流通的领域，承载大量的物资和人员，沟通两岸政治、经济、文化的联系，造就两岸融为一体。历史生动地说明，海上交通是两岸经济互动的桥梁，文明进步的阶梯。滔滔海峡水，悠悠两岸情。几百年的风雨沧桑，没有也无法切断海峡两岸海上交通的事实，反映了两岸同处一个海洋环境里的共同社会需求。如今，直接通航是两岸人民要求“三通”的最强烈呼声，回顾海峡两岸海上交通史的经验教训，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001年8月，福建省闽台交流协会、福建省运输管理局、福建社会科学院、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和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主办的“海峡两岸海上交通史学术研讨会”在福建泉州举行，两岸学者70多人参加研讨，气氛相当热烈，内容涉及各个历史时期海峡两岸海上交通的方方面面，诸如港口码头、船舶演变、海洋运输、海洋贸易、海洋交通民俗等等，兼及对当前两岸海上直航的学术思考，堪称海峡两岸交通史研究的一次盛会。本书将提交会议讨论的大部分论文结集出版，并定名为《海峡交通史论丛》，希望有助于读者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和了解。

这些论文反映作者个人的观点和对史料的认识，有一定的学术价值。但无庸讳言，有个别论文研究深度还不够，创新性不足；有些新见，还缺乏确凿的证据，显得比较单薄。虽经会议讨论指出，作者认真修改，一时难臻完善。至于相关论文中出现不同的观点和不同的解读，是学术讨论中的正常现象，编辑时未予改动，其中的得失，敬祈读者自行鉴别。

台湾的开发、移民，以及两岸贸易往来等与海峡两岸海上交通密切相关。海峡两岸海上交通史是一个有待深化的研究领域，本次会议开启了一个良好的开端。“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相信两岸学者的继续努力，交流合作，会使这项研究更上一层楼，为推动两岸直接“三通”作出更大的贡献。

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杨国桢

2001年12月1日

目 录

(一) 古代交通篇

闽台两岸古地貌与考古文化比较

——兼论闽台远古交通

..... 福建省昙石山遗址博物馆馆长、研究员 欧潭生 (1)

古代闽台交往与台湾开发

..... 福建省方志办副主任 卢美松 (8)

论闽台海洋文化的起源

..... 福建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徐晓望 (17)

闽台航运史的史料探索

..... 福建社会科学院现代台湾研究所副研究员 陈榕三 (27)

略论古代台湾的海上交通

..... 福建师范大学闽台区域研究中心教授 谢必震 (34)

孙权与航海

..... 福建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罗肇前 (39)

古越族的丁艚船——雅美木舟 集美航海学院高级工程师 陈延杭 (44)

(二) 明清交通篇

内河航运与台北开发的省思

..... 台南师范学院乡土文化研究所所长、副教授 管志明 (50)

明郑时期台湾海峡两岸海上交通问题的探讨

..... 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邓孔昭 (58)

清代台湾地方的开发与岛上对外交通

..... 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教授 李祖基 (67)

清代海上交通渡台政策之研究

..... 台湾海洋大学亚太中心教授 郭展礼 (80)

清代前期福建平民偷渡台湾

..... 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教授 陈孔立 (87)

台湾省会选址论 ——清代台湾交通与城镇体系之演变

..... 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副研究员 周翔鹤 (94)

清代北港的闽台贸易

..... 台湾空中大学人文系副教授 蔡相辉 (103)

清代大陆产猪对台湾的输出

..... 关西大学文学院教授 松浦章 (114)

(三) 近代交通篇

试论日据时期的台海两岸交通

..... 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副研究员 陈小冲 (121)

试探近代福建与台湾、日本的三角贸易特征

..... 福州市博物馆副馆长 陈子华 (132)

台湾的海港重建与货物运输 (1945—1949 年) 摘要

——以基隆港及高雄港为中心的探讨

..... 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汤熙勇 (142)

“小上海”——布袋港之繁华、沧桑及希望

..... 台湾布袋港发展促进会理事长 蔡武璋 (144)

20 世纪 30 年代泉台的海上走私活动

..... 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助理研究员 陈丽华 (154)

日据时期大陆来台之制茶工

..... 台湾台北市文献会研究员 卞凤奎 (160)

(四) 交通民俗篇

略述海峡两岸海上交通民俗

..... 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研究员 李玉昆 (174)

台南市安南区 (原台江地区) 拓垦的空间研究初探

——以学甲镇中州陈姓族人为例

..... 台湾台南师范学院乡土文化研究所副教授 黄世祝 (181)

泉州琅玕陈氏家族及其从事闽台商贸航运事

..... 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馆员 叶恩典 (213)
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助理研究员 庄春泉

闽台交通与两岸家族文化的发展

——以“林日茂”家族为例

..... 福建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杨彦杰 (217)

(五) 通航务实篇

实现海峡两岸海上双向直航是历史的必然

——从海峡两岸试点直航看两岸海上双向直航

..... 福建省运输管理局局长、海峡两岸航运交流协会常务理事 马继列 (230)

论海峡两岸直航问题

..... 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教授 李 非 (234)

海峡两岸试点直航中航商关注的问题及建议

..... 福建省厦门轮船总公司副总经理 陈茂森 (248)

厦门特区先行先试 推进两岸海上直航

..... 集美大学教授 李连亭 (252)

从区位整合初探金厦港埠发展策略

..... 金门观光协会顾问 林振查 (257)

布袋港在两岸航运史上的再定位

..... 台湾云林虎尾科技大学进修推广部教育组组长 翁顶升 (272)

台湾台中侨光技术学院教务处出版组组长 陈瑛珣

从台湾经发会看“戒急用忍”松绑与“三通”的前景

..... 台湾淡江大学中国大陆研究所教授 潘锡堂 (284)

海峡两岸学术文化交流协会副理事长

“两岸商机”与“戒急用忍”

..... 台湾真理大学国际贸易系主任、教授 龚春生 (286)

两岸航运课税的差异与统一

..... 台湾中国文化大学经济系教授 于明宜 (318)

台湾中国文化大学政治系讲师 陈 虹

闽台两岸古地貌与考古文化比较

——兼论闽台远古交通

福建省昙石山遗址博物馆馆长、研究员 欧潭生

闽台两省隔海相望，但原来同属中华大地，是连在一起的陆地，后因地壳运动出现台湾海峡，才将两地割开，台湾海峡最窄处只有 130 公里。台湾海峡为浅海区，一半以上的水域深度在 50 米左右，最深处不超过 100 米；而台湾以东 10 余公里的水域水深都在 100 米以上，再往东 100 公里处便是 4000 米以上的太平洋深海。台湾本岛南北长而东西窄，略呈纺锤状，四周海岸地质呈现出不同的类型：东部为断层型，西部为凸起型，北部为谷湾沉溺型，南部为珊瑚暗礁型。根据地质学和地球物理学的研究，台湾与大陆原为连体，东海岸才是大陆的边缘。

台湾著名地质学和古生物学家林朝棨先生在《台湾一百万年以前之野兽》一文中指出：台湾西部地区出土的剑齿虎、剑齿象、普通象、犀牛、野牛、野猪、大角鹿以及中国独有的四不象等大型哺乳动物化石证明，这些古脊椎动物都不可能游泳过海，而是远古时期沿着大陆架迁徙到台湾的。大陆著名海洋地质学家赵希涛先生在其近著中也指出：“在 16000~15000 年前的晚玉木极盛时期，海面下降至最低深度——150~160 米。代表水深 150~160 米最低海面的古海岸线与大陆架外缘破折线重合，在现代海底地形上，由济州岛东侧呈弧形外凸地绕过我国钓鱼岛外侧，最后弯向台湾东北角。”^①因此，当时的台湾并非一个岛屿，而是与大陆架相联和突出于广阔的陆架平原上的一片山地和丘陵。只是到了后来，“中全新世中期，发生了世界范围的大海浸，台湾海峡两岸也不例外。在海峡两岸，这次海浸淹没了闽江、九龙江、韩江等几乎所有的河流的河口与海湾，使一系列基岩山、丘成为与大陆隔离的岛屿。……其形成年代在距今 6000 年 5000 年间，可称黄隆期海浸。”^②换言之，台湾与大陆分离，是在距今五六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

正因为台湾与大陆原是连体，在闽台之间动物可自由迁徙，植物可互相传播，人类更可以自由往来。日前发现台湾岛上有 64 种兽类源于大陆，并且都是更新世期间从大陆迁徙到台湾的。台湾的树种，与大陆东南沿海相同者多达 67 属、81 种、1 个变种。台湾中央山脉大理石中所含纺锤虫、希氏虫、瓦氏珊瑚等化石都与华中、华南二迭纪地层中的同类化石相同^③，台湾本岛酸性火成岩体与闽、浙两省相同^④。台东大南澳片岩中的石灰岩层与华中、华南古生代晚期海相地层中的石灰岩层相同^⑤。据此，人们自然得出一个共同的结论：台湾岛本来就是中国大陆的一部分，台湾山脉本来就是大陆东侧的“界缘山脉”。根据国际法庭 1969 年 2 月关于西德、丹麦、荷兰之间的北海大陆架划界判例，“大陆架的主权界限之划定，应符合沿海国家陆地领土自然延伸的原则”按此原则，台湾及其附近

岛屿属于我国大陆架主权界限范围内，与祖国有不可分割的领土关系。近年来，闽台两地考古学者发现的旧石器、新石器和商周时期文化遗址、遗物等，更证实了远古时期闽台经济文化关系十分密切。

一、旧石器时代的闽台考古文化比较

台南县左镇乡的菜寮溪溪岸，很早就发现有更新世的哺乳动物化石。1970年夏，在该地采到一片灰红色的人类头骨化石，长约21.6厘米、宽约12.7厘米，经鉴定是一块20岁左右青年男性人类的顶骨，用氟锰法测定其年代有3万年以上，被命名为“左镇人”^⑥。有人考证左镇人属于北京人的一支，与山顶洞人的年代相近。

台东县长滨乡八仙洞的旧石器时代遗物是1968年底至1969年初发现的，有6000多件石器和100多件骨角器，被命名为“长滨文化”，距今约1.5万年，其基本类型和制作技术与湖北大冶石龙头和广西百色上宋村两处出土的旧石器时代砾石砍砸器相似，以一面打制的偏锋器为多，以石片为主，可以看作是大陆旧石器文化向东南发展的一支^⑦。

1988年，福建清流沙芜乡洞口村狐狸洞内也发现一枚古人类牙齿。根据洞内地层性和伴生哺乳动物化石，可以推断其年代距今1万多年，与台湾长滨文化主人的年代相当，而且都以洞穴为活动场所被命名为“清流人”。1987年，在福建东山县城关镇附近采集的一件古人类肱骨化石残段，经鉴定其年代略晚于“清流人”，被命名为“东山人”。据《化石》杂志主编、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副研究员尤玉柱等专家研究认为，从福建东山岛东南，经南澎湖浅滩、北澎湖浅滩、台西浅滩到台湾本岛，有一条水深不过40米的“陆桥”。东山人就在这陆桥的左端被发现。我国旧石器文化和古人类分布的地点比较集中在北回归线至北纬26°之间的华南地区，即在西起云南、东抵台湾的范围内。而闽南和“东山陆桥”是古人类跨越海峡进入台湾的必经之地^⑧。

上述科学见解，进一步被新发现的考古材料所证实。1989年12月中旬，曾五岳先生在漳州市北郊莲花池山发现旧石器13件经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张森水、尤玉柱先生鉴定，属于旧石器晚期的遗物。1990年2月9日至11日，尤玉柱先生亲临现场考察，对曾五岳先生已经发现的19处旧石器地点作出了初步的分析和评价：认为这个旧石器地点群分布在九龙江北溪和西溪间的风化台地上，范围约20平方公里。台地晚更新世下层红土中发现石器20余件，人工打制痕迹较明显，均以脉石英为原料，大多数为石核或废片，属于使用的石器仅有2件，均为刮削器，加工简单，都用锤击法制成。上层红黄色砂质粘土中发现石器300件，其中精品约60件，基本上都属于细小石器范畴，都以锤击法制作，不同于北方的压制法。石器类型多样，有尖状器、雕刻器、类箭镞、直刃刮削器、凸刃刮削器、凹形器、端刮器，可谓丰富多彩、加工精细，实属我国东南部最精彩的石器地点群。其中类箭镞和凹形器最富地方特色，类箭镞可能用于狩猎，但比通常认为的箭镞要厚一些（即原始性）。凹形器不同于通常所说的凹刃刮削器，后者据石片的原形顺其自然地修成刃缘，而漳州凹形器显然是有意打成一个具有圆形缺口，再经仔细加工

而成的。这种器物可用于修制复合工具的杆，作抛光工具。

漳州郊区的旧石器地点群，目前根据大部分石器分布于红黄色砂质粘土中并有少量已经化石的骨骼伴出，初步断定石器的时代应为旧石器时代末期，距今约1万多年，与台湾长滨文化年代相近。在台东长滨乡所发掘的四洞中，潮间洞出土石器最多，有所谓“较细材料制的石器”^⑨，漳州郊区发现的旧石器与之极为相似。潮音洞石器“都是利用水里滚磨出来的砾石，加以打剥制成。”“绝对多数是直接敲击砾石面，连续打下来的石片。”“共得数百件标本，但未见于乾元洞，在海雷洞100多件石器中仅出现过两次，其余的都出土潮音洞。”漳州郊区发现的数百件细小石器与台东长滨乡潮音洞出土的数百件细小石器石质相似、制法相同（都是锤击法）、时代相近。更值得注意的是，台湾大学地质学系教授林潮荣先生调查台东县长滨乡八仙洞各个不同高度的海蚀洞穴时，认为它们的“年代可能属于古老的红色土层，因此推想或许能发现到比新石器时代更为古老的文化层”^⑩。无独有偶，尤玉柱先生在调查漳州郊区旧石器地点时也注意到属晚更新世的红土层，指出“红土主要是粘土，中间有很薄的一层砾石层，内含石器，这一层的时代推测应是4—8万年前。”随着考古发掘工作的开展，闽台两地所展现的旧石器时代的经济文化关系愈来愈明显。去年省政府新闻发布会公布的三明万寿岩旧石器时代遗址距今18万年，更证明闽台古人类源于大陆。

二、新石器时代早期——福建壳丘头文化和台湾大坌坑文化

国际学术界有一种“台湾日月潭农业起源说”，曾被当做东南亚为世界农业最早发祥地的有力支柱。事实上这种说法的考古学证据不充足，因而未被学术界普遍接受。此说主要根据对日月潭湖底泥炭层的孢粉进行分析，显示距今1.2万年以前当地原始森林逐渐为次生森林所代替，因而得出这是人类农业活动的结果。许多考古学家认为，1.2万年前以农业遗迹在全世界犹属罕见，处在远离农业起源中心地带的台湾岛，更不可能出现这样早的农业活动。况且，日月潭周围的新石器早期遗存中农业痕迹也不显著，因此“日月潭农业起源说”难以成立。日月潭湖底泥炭层孢粉变化和木炭增加的现象，可能是多次森林火灾所致，而不是人类烧垦开田的结果，1964年，有冢田松雄开始的日月潭湖底泥炭层孢粉分析，倒是为我们揭示了新石器时代（公元前5000年到1500年期间）台湾海峡两岸的古代生态环境面貌：“高水面，潮湿温暖的气候，物产资源丰富多样。住民占居沿海的台地上面，面前有海产和河口产物，转身背后有台地森林河谷的物产”。^⑪迄今所知的台湾海峡地区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即有陶器和可能有农业的考古学文化，是福建的壳丘头文化和台湾的大坌坑文化。关于壳丘头文化，根据1985年发掘的福建平潭县平原乡南垅村的壳丘头遗址，其主要特征是：

1、石器中有一定数量的打制石器，特别是打制后稍经粗磨的小石器为数不少。还有少量磨制精细的穿孔石斧、石刀和杵、臼等。

2、骨器有凿、匕、锥、笄、箭头等，还发现一件蚝壳制作的贝耜。

3、陶器以夹砂陶为主，占总数的 90% 以上，胎质较厚、火候低、陶色杂，圜底器居多，次为圈足器，器型有釜、罐、盘、碗、壶、豆和各种形态的陶支座。

4、最富特征的是陶器口部和肩部的贝齿纹（即利用蚶类贝壳边缘齿纹压印在陶胚上而成）装饰。

这类遗存在大陆除平潭壳丘头和南厝场两处外，还有闽侯白沙下层、闽南金门富国墩、广东潮安陈桥等；在海峡东岸的台湾岛上遗址更多，业经详细报道的有台北大坌坑、台南六甲村和高雄凤鼻头下层遗址等。

福建壳丘头文化与台湾大坌坑文化，均属海岸文化范畴。它们皆背山面海，农作物以薯芋为主，狩猎以鹿、猪等中小动物为主。从两个文化的大量贝壳堆积反映出它们的主人主要靠捞鱼、捞贝的“讨海经济”为生。因此，壳丘头文化中的陶器最普遍的纹饰是各种贝齿纹，以血蚶贝壳为主；台湾六甲村的大坌坑文化也有此类贝齿纹。大坌坑文化陶器的纹饰以各种的绳纹为主，表明植物学纤维的绳索在这个文化中的显著地位，也说明人们对纤维植物的广泛种植和应用，可说是原始农业的象征。壳丘头文化中也有大量绳纹装饰，它与中原内陆的绳纹装饰大同小异。遗址中出土的石斧、石刀、杵臼和贝耜，反映了原始农业的出现，这比大坌坑文化的内涵要更丰富、更先进些。总的看来，大坌坑文化和壳丘头文化内涵相似，面貌也基本一致。

大坌坑文化的石器也以小型石斧、石锛、石箭头为主，还出现了石网坠和“树皮布打棒”。陶片也是夹砂体厚，绳纹、刻划纹、波状纹装饰，出现红色彩条涂在唇外。其生产方式无疑包括打猎、渔捞和采集在内。大坌坑文化碳十四测定绝对年代为公元前 4350—4450 年（树轮校正），与华北半坡和仰韶文化年代相当。壳丘头文化中的金门富国墩碳十四测定绝对年代平均数值也在公元前 4000 至 5000 年之间，与坌坑文化年代相当。因此可以说在距今 6000 多年前，闽台两地自然环境相似，经济形态相同。闽台先民创造的壳丘头文化和大坌坑文化代表了新石器时代早期台湾海峡两岸的原始社会文化。

三、新石器时代晚期——福建昙石山文化与台湾凤鼻头文化

昙石山位于福州西 22 公里闽江北岸 20 多米的台地上，自 1954 年起经 8 次发掘。这个遗址分上、中、下三个文化层，是同一个文化的持续发展。学术界最新的研究认为：昙石山上层文化已进入青铜器时代，以几何印纹陶为主要特征。中下层是新石器时代晚期遗物，距今 4000 至 5500 年之间，是为昙石山文化的代表。目前考古界所说的“昙石山文化”包括闽侯昙石山中下层、闽侯榕岸庄边山下层、闽侯白沙溪头下层、福清东张下层等遗址。近几年的文物普查发现，闽西北的清流、光泽、将乐；闽东的霞浦，闽南的诏安等地均发现有与昙石山文化相类似的陶器。昙石山中下层文化在生产工具方面，以磨制石器为主，其中以背部凸起、横剖面呈等腰三角形的石锛最具典型性；骨器精细，镂孔贝耜和贝刀为该文化显著特征之一；陶器纹饰以绳纹居多，出现镂孔和彩绘，器形有鼎、豆、釜、碗、杯、高领罐、簋豆等。这些特征显然不同于壳丘头文化，而与湖北的屈家岭文

化、江西山背文化、山东大汶口文化等相似，而年代却晚了几百年。据此，张光直先生将昙石山文化归入“龙山形成期文化”，是有一定道理的。但他将昙石山文化看成大陆的“汉藏语文化”，将壳丘头（富国墩）文化看成东南沿海的“南岛语族文化”，并将二者截然分开^⑧，显然不妥的。从考古类型学分析，昙石山文化与壳丘头文化有较大差异，但那只是表明它们所处的发展阶段不同，而文化因素的诸方面都有着许多共同点：①石器均以小型石锛为主；骨器相似；壳丘头的贝耜演变成了昙石山文化的显著特征物之一。②陶器器形相似；二者都盛行圜底器和圈足器；饮器都是陶釜；高领罐领肥厚凸起，上饰压印纹、刻划纹等。③昙石山文化下层具有典型特征的素面红衣夹砂陶和泥质磨光红陶，在壳丘头遗址中已有少量发现。④壳丘头陶器纹饰中的绳纹、条纹、刻划纹、压印纹等继续存在于昙石山文化中，部分贝齿纹、戳点纹也见于白沙溪头下层的某些陶片中。凡此种种，证明昙石山文化与壳丘头文化有着承袭关系。

台湾凤鼻头文化接近 4500 至 5000 年之间，与福建昙石山文化年代相当。张光直先生认为：“（台湾）中南部与澎湖的凤鼻头文化早期的陶器中的若干重要特质可能是有大坌坑文化原型进一步发展出来的，但凤鼻头文化的许多新颖的文化物质和稻米农业，农具和陶器形制中的鼎和豆，与大坌坑文化扯不上关系，却与海峡西岸的马家浜、崧泽、河姆渡及昙石山文化有显著的类似，可能是后者影响之下而产生的”，并“推测是自大陆渡海东来的”。^⑨。张先生这段对比研究的论点是符合事实的。闽台两地在四、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同步进入了农耕社会。福清东张遗址发现稻草痕迹，台湾凤鼻头遗址陶片上有稻米的遗留，说明当时的闽台先民已经开始种植水稻^⑩。

闽台新石器文化中，考古学者经常引用的有肩石斧、有段石锛的共同关系，可以作为闽台古代经济关系密切的佐证。有段石锛起源于长江下游地区；有肩石斧起源于广东珠江三角洲，但传播的途径必然是先福建、后台湾。闽台彩陶的分布都与沿海两岸陆地有关，其中必然与海洋文化相联系。两岸凹石工具的研究，也证明了闽台先民共同的“讨海经济”生活。凹石是一中加工贝类食物的石工具，由于长期敲击各类贝壳，在其表面留下使用的凹痕。敲击的部位不同，往往在其正面、反面和两侧形成数个深浅不一凹痕，这是沿海古代遗址中独具特色的石器。台湾已出土数以千计的凹石标本。福建方面，最近也比较注意收集研究，1988 年 11 月，省考古队在云霄县墓林山遗址发现 150 多件凹石。在出土凹石的遗址中，一般都有很厚的贝壳堆积。金门富国墩遗址贝壳以血蚶为主，台湾鹅銮鼻第二史前遗址中出土的贝壳经鉴定有夜光螺、银口螺、珠螺等 12 种，从各种动物遗骸估算，贝类占 69.47%、电类占 21.97%、兽类占 8.41%、鱼类占 0.15%，这个数字反映了“采贝经济”在生活中比重。凹石是闽台沿海地区原始社会的独特的石器，其他地区没有发现，而且也仅分布在海峡两岸的滨海地带，这说明新石器时代的闽台文化同属于以采贝经济为主的海洋贝丘文化。

综上所述，闽台考古文化的相似和互相影响，反映了闽台远古文化的交流。连江战国

晚期大型独木舟就是远古人类渡海到台的交通工具。他们熟悉海洋、驾驭海洋，远古交通创造了闽台两岸同根同源的灿烂文化。

四、闽越文化在台湾的考古证据

闽台古文化源远流长，我在台湾研究丛书《闽台经济关系》第一篇第一章（鹭江出版社 1992.8）和《中国文物报》（1997.6.15）、《福建文化报》（1997.6.20—7.5）先后发表了一些看法并提供了第一手的考古资料。这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学术课题，应引起我们学术界的重视。

1997 年 4 月底，笔者赴京参加母校北京大学百年校庆筹备会议。北大考古系赵朝洪教授向我展示了台湾学者寄来的台北十三行遗址出土的 7 片陶片，其中一片是典型的黄土仑文化硬纹硬陶，纹饰为变体云雷纹，是模仿中原铜器的蟠虺纹，即源于生活的蛇纹，类似小蛇的盘曲状。这种小蛇状纹饰与文献上记载的先秦闽族崇蛇信仰、以蛇为图腾的习俗有关。还有 6 片方格纹、水波纹印纹硬陶应属汉初闽越族陶器。这种陶片在笔者主持发掘的福州新店闽越故城曾出土上千片。在北大考古系，恰逢台湾考古学者臧振华教授举办《台湾考古》讲座。笔者在勾园宾馆臧教授住室探讨了先秦闽族与汉初闽越族渡海到台的问题。臧教授赠送的《台湾考古》一书彩色图片中的植物园文化陶片，大湖文化黑陶片，以及台北十三行遗址出土的方格纹陶罐上都有闽越族汉初陶器上盛行的方格纹、水波纹等印纹。双方惊喜地发现，先秦闽族的黄土仑文化和汉初闽越族文化渡海到台的考古证据已初露端倪。今后，加强两岸的学术交流和考古合作，必将对源远流长的闽台考古文化作出系统的回答。

注释：

①赵希涛：《中国海岸演变研究》，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30 页。

②同①，第 57 页。

③《台湾丛谈》，台湾史迹研究会 1987 年版，第 31 页。

④魏淑贞：〈台湾与大陆的血缘密切〉。载香港《文汇报》1979 年 11 月 19 日。

⑤同①。

⑥日本学者下田信男教授用氟锰法测定是 3 万年以前的人类化石，日本学者马场悠男教授鉴定是约 20 岁左右的青年男性，见台湾《中央日报》1975 年 3 月 21 日。

⑦韩起：〈台湾省原始社会考古概述〉，载科学出版社《考古》1979 年第 3 期。《台湾日报》1973 年 1 月 21 日，〈台东八仙洞旧石器文化发现的意义〉。

⑧尤玉柱、张振标〈论史前时期的闽台关系及文化遗址的埋藏规律〉，《闽台古文化论文集》，1990 年《福建文博》增刊，第 9 页。

⑨《台湾丛谈》，台湾史迹研究会 1978 年版，第 27 页。

⑩同⑨，第 19 页。

⑪韩起：〈台湾省原始社会考古概述〉，见科学出版社《考古》1979 年第 3 期。

⑫张光直：〈新石器时代的台湾海峡〉，科学出版社《考古》1989年6期。

⑬同⑫。

⑭此外，福建南安丰州狮子山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稻谷壳痕迹；永春九鼎山陶瓮壁上发现印有稻秆和谷壳的痕迹；台湾牛稠子遗址发现粟（谷子）的遗迹。

古代闽台交往与台湾开发

福建省方志办副主任 卢美松

闽台之间海上交往历史悠久。随着大陆（包括福建）社会的发展，与台湾的交往逐渐密切；同时，也随着两岸交往的密切，推动了大陆对台湾的移民及其对台湾的开发。闽台之间因其地缘关系密切、往来交通方便、人缘天然亲近，所以造就了两岸特殊的历史联系和现实关系。我们研究自古以来闽台两岸交往的历史，探索福建人对开发与建设台湾所做的独特贡献，探究闽台交往的形式与内容，了解其特点与规律，对于研究当前与今后的闽台关系都是十分有益的。

一、唐代以前的闽台交往

应该承认，中国古代至少从战国时期开始，中原人对祖国大陆东南沿海一带（包括台湾岛）已经有所了解，并且明确地把他们作为归化的国、族加以记载。《尚书·禹贡》称：“岛夷卉服，厥篚织贝，厥包桔柚，锡贡。”由于书称“淮、海惟扬州”，即淮河以南，直至大海之间，都是扬州区域，所以，多数学者认为，此处“扬州”岛夷是指大陆东南和南部沿海一带（包括岛上）的土著居民，当然也包括台湾岛上的先住民。这些先住民，既有远古时代涉足岛上的闽族人及其先民，也有战国秦汉时期的闽越人；还有如一些学者指出的，来自马来半岛或菲律宾等地南岛语系的土著居民，而他们的先祖，据称也是更早以前自南中国迁往海外各地的古越人。

这些长期生活在海边的闽人和越人，自古便“以舟为车，以楫为马”，“习于水斗，便于用舟”。因此他们横越台湾海峡，实施海上交通是不成问题的。从这些“岛夷”向中央王朝（周王朝）进贡的礼物可见，确是地方土产或特异之物：桔、柚和“织贝”。《逸周书·王会》篇载还有：“东越海蛤”。这些，显然都是福建沿海和台湾的土特产。这织贝，有专家考证，就是用贝壳精心制作的织物——贝珠衣。这种台湾先住民特有的服饰，制作艰难，是极为珍贵的盛装之服，一般只有部落酋长或氏族社会的有力者才能穿着或拥有。而且，从“岛夷”的进贡路线，也可看到其海上交通的能力与特点——“沿于江、海，达于淮、泗”。他们确是从沿海而进入内河，最后抵达京师的。

更有学者指出，《山海经·海内南经》所指“闽在海中，一曰闽中山在海中”。显然表明闽即台湾，或至少包括台湾。因为，只有它在最近一次冰期之后的六七千年前，重为大海所包括，成为孤悬海外的岛屿，沿海大陆架被淹没在海峡海水之下。而“其西北有山”，或指近处的福建“唐山”，或指远处“闽山”——武夷山。商周秦汉时期，中原地区（中央王朝）对“岛夷”的了解十分有限，但其地纳入版图，其“国”服属王朝，其人定期贡献，却是肯定的。我们不能因为文献的缺陷而否定这样的历史事实；相信将来的考古发

现，必将弥补这一方面的缺憾。汉代以前的闽台、陆台海上交往，详情不得而知。《后汉书·郑弘传》载：“旧交趾七郡，贡献转运。皆从东冶，泛海而至。”指明东冶（今福州）港在汉代已是我国东南地区海外交通与贸易的重要港口和货物转运地。但尚未述及与台湾地区的交通、贸易情况。

《汉书·地理志》和《后汉书·东夷传》均载：“会稽海外有东鯀人，分为二十余国，以岁时来献见”。有人认为，“东鯀”是指台湾，其民即岛上夷人。《越绝书》和《吴越春秋》书中多处提到“东海外越”，所指应包括台湾。《史记·东越列传》载，汉武帝发兵援救南越、攻打闽越时。闽越王郢出兵抵抗，其弟余善与其相及宗族谋，要杀王“以谢天子而求和，不行，乃力战；不胜，即亡入海”。其“入海”云云，即指逃亡入台湾诸岛，这应不是余善等人忽发奇想，此前必有闽人、越人经常往来闽、台之间，故有这样的主意。正如连横《台湾通史》所载，楚威王灭越后，“越之子孙迁于闽，流落海上或居于澎湖。”《史记·越王勾践世家》称：“越以此散，诸族子争立，或为王，或为君，滨于江南海上”。这些表明，东南沿海越人（包括闽越人）历来都有进入台湾岛的打算和行动。而最早、确切记述台湾岛和岛夷情况的，应数三国时吴国丹阳太守沈莹所著《临海水土志》。该书记述“夷州”情况，包括地理、气候、物产、社会及越王传说等；人们多认为“夷州”应指台湾。《三国志·吴志·孙权传》还记载，亶洲“人民时有至会稽货布（市）”，即进行贸易活动。这种贸易活动连远在亶州的人都要来，那么更为近便的台湾夷人就更不成问题。而且记载：“会稽东冶县人海行，亦有遭风流移至亶州者”。可知福建人的海外交往是频繁的，也必然有到“夷州”的。事实的确如此，同传还载：孙权为“远规夷州，以定大事”，遂于吴永安二年（230年）春，遣将军卫温、诸葛直，“将甲士万人，浮海求夷州、亶州”，“军行经岁”，因亶州“所在绝远，卒不可得至。但得夷州数千人还”。孙吴政权在三国鼎立中偏促东南，实力不足，故费60余年时间经营闽中；同时，又派舟师远征海外，无所收获，只是掠回一大批人口。这些人口可能部分充作战斗力，部分充作劳动力。

《隋书·流求传》对台湾情况的记述也稍详尽。它记载好大喜功的隋炀帝，先后于大业三年（607年）、大业六年（610年）、大业七年（611年），分三次派遣将军朱宽、陈棱、张镇周等率水师入海，“求访异俗”，“因到流求国”。结果，或“掠一人而返”，或“取其布甲而返”；或“发兵万余人”，“击流求国”，“虏其男女数千人，载军实而返”。最后一次征伐，也是“获男女口千余人，并杂物产”。隋军多次进入台湾，主要是进行武力征服和经济（包括人口）掠夺。这说明，历史记载的自吴至隋近400年间，大陆政权对台湾因缺少沟通和了解，更缺少经济贸易的准备，所以其“求访”、“慰抚”等的主观愿望皆未实现，最终还是诉诸武力。相反，台湾土著人却对经济贸易感兴趣，他们在第二次陈棱率大军击讨时，反不以为意，以致“流球人初见船舰，以为商旅，往往诣军中贸易”。这表明，此前确实有过大陆（福建）人去台贸易的先例，才使流球人犯了“经验主义”错误。史载隋炀帝决心派军入海是因为听信福建人“海帅”何蛮的话，看来当时对台湾岛了解最多的